2026年10月20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陈 璐
电话:010-64294501 E-mail:pinjian2023@163.com
中国文化报

礼制、宫苑、星象……

古代方志插图中的历史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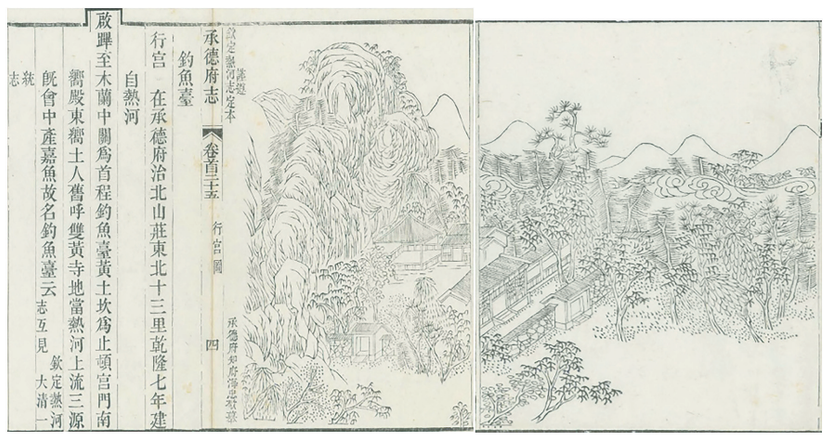
彭 志

古代方志作为记录一方地域历史、风物典制的核心地方文献，历来为文史研究者所重视。这些方志中著录的插图同样不容忽视，它们并非文字内容的简单附庸，而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图像史料。一幅幅插图与文字彼此参证、互补增益，把已经消逝的器物形制、皇家建筑格局、古人心目中浩瀚的宇宙图景等完整留存下来，成为解读传统社会制度、精神世界的重要材料。在浩繁的方志插图遗存之中，礼器图、行宫图、星野图三类题材内涵丰厚，极具研究价值。

礼器为古代社会开展祭祀、宴飨、征伐、丧葬等礼仪活动时的专用器物，是古代社会等级秩序、思想信仰、政治权力与集体文化认同的物化载体。自先秦以来，国家礼制便对礼器的形制、材质、纹饰有着细密严苛的规定。中央王朝的礼制条文要落地到州县地方，文庙祭祀是颇为重要的实践载体。为留存制度范式，不少明清方志专门收录文庙礼器图，并附上翔实图说，记录每件器物的各项细节，《(光绪)滦州志》便是颇具代表性的样本。这部刊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地方志，于卷十一“学校志”中专设篇目，收录了15幅文庙礼器图，爵、登、铏、簠、簋、笾、豆、簠、俎、尊、祝版、祝版案、酒尊桌、镫、香炉等文庙祭祀核心器物全部绘录在册。每一幅插图都配有长短不一的图说，细致著录器物的铸造材质、整体尺寸、各部位规格、雕刻纹饰。



(清)杨文鼎修、(清)王大本纂《(光绪)滦州志》卷十一著录“爵图”“登图”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海忠纂修《(道光)承德府志》卷首二十五著录“钓鱼台行宫图”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通读是志中的图说可以看到，青铜铸造的爵，腹部雕刻雷纹饕餮，纹样繁复庄重；竹编而成的笾，内部衬以绢帛，器物顶部与边缘髹涂朱红大漆；俎等木作器物遍施丹漆，器物长宽高低的规格，会根据正位、配位、哲位等不同祭祀位次做出明确区分。依据制作材质与实际功用，这15件礼器图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别：青铜礼器居于祭祀体系的核心位置，承担盛放酒醴、供奉祭品的职能，器物的形制、纹饰都必须严格遵从朝廷礼制规范；笾、簋等竹制礼器辅以漆、绢装饰，质地轻便，主要用于收纳各类供品；俎、祝版、祝版案一类木质器物，多用于陈设礼器祭品、安放祭祀祝文；镫作为祭祀现场的照明用具，材质不拘泥于铜、锡、铁、木，形制规格可以根据烛火大小灵活调整。这批礼器图搭建起中央朝廷典章制度文本与地方文庙实际执行之间的史料桥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朝廷礼书多载制度、少记地方实操的缺憾，也为出土礼器、复原文庙祭祀器物提供了较为精准的数据参照。

帝王巡幸四方之时临时驻跸的居所谓之行宫，它不只是帝王休憩落脚的场所，同时兼顾处理政务、接见臣属与边疆部族首领的功能，集生活起居与政治活动于一体。将行宫的建筑格局、周边山水环境摹刻入志，便形成独具特色的行宫图。清代行宫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广泛散落于京畿腹地、运河沿线、皇家猎苑、帝王陵寝周边以及边疆要地。承德地区坐拥清凉的山地气候，又是清代经营北疆的军政枢纽，境内行宫鳞次栉比，避暑山庄便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代表。《(道光)承德府志》卷首留存10余幅行宫图，钓鱼台、黄土坎、中关、张三营、喀喇河屯、王家营等10余处行宫悉数绘入志书，每一幅图像都配有详细图说，记录行宫营建年代、地理位置、殿宇格局、匾额题字及周边山水风貌。

康乾时期是承德行宫大规模营建的高峰阶段，行宫选址兼顾山水景致、交通驿路与军政需求。钓鱼台行宫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地处热河上游，三道河水汇流于此，水中盛产嘉鱼，行宫也因此得名，它是帝王奔赴木兰秋狝路途上重要的中途驻点。张三营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紧邻崖口隘口，山势雄奇峭拔，每到秋季，山林层林叠翠，云烟变幻，清代帝王木兰秋狝往返途中常常驻跸于此，在这里设宴犒劳随同狩猎的蒙古各部王公。喀喇河屯行宫的修建年代早于避暑山庄，滦河穿行宫腹地而过，依山带水，素有“小金山”之美誉，这里是塞外尤为重要的驻跸之所，康熙、乾隆、嘉庆等多次到此驻留，留下了大量题咏诗文。这些行宫图作为清代木兰秋狝、帝王巡幸制度珍贵的图像实证，留存了清代皇家建筑布局与园林造景的审美范式，也保存着清代边疆治理、民族交往的鲜活线索。

如果说礼器图、行宫图描摹了人世间真实存在的器物与建筑，星野图则映照出古人仰望苍穹而生的浪漫宇宙想象。古人将天上二十八星宿、十二星次，一一对应到地面上的州郡国土，试图借助天象的盈亏变化，预判对应地域的祸福灾祥，此种学说称为星宿分野。《(雍正)朔州志》收录了15幅星野相关图像，包括天文全图、浑天仪图、天元云汉图、太极北斗七星图、古分野图、汉术天文分野图、复古分野图、北斗魁分主冀州图、天市垣寓晋星图、金水二星主山西图、女宿寓晋星图、星分胃宿图、星分昴宿图、星分毕宿图、星分井宿图。图说之中，不仅汇录天象知识，还融入大量学理思辨，也不乏对传统旧说的理性质疑。

《(雍正)朔州志》卷二“图考志”开篇即阐释方志绘图的核心要义：文字擅长记述史事义理，图像长于摹拟万物形骸，二者功能各有侧重，不可偏废。方志编纂者将天文、疆域、建置类图像置于各志正文之前，做到读图而后阅志，图与志分而不杂、合而一体，帮助读志者更加透彻地把握地方情状。在“星野图考”中，编纂者进一步辨析史书天文志与方志星野志二者的功能分野：官修史书记载天文，意在敬顺天道，构建皇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而地方志设立星野志，重在观测天象、占验吉凶，服务地方农事生产、灾害预警等现实社会需求。过往不少旧志记述星宿分野往往只言片语，简略残缺，读者难以窥见完整的星野知识体系。故此，《朔州志》广采前代典籍，汇录周天星象、浑天仪制度、二十八宿、历代分野学说，兼顾天象知识普及与地方占候的现实功用。

礼器图凝固传统礼制文明，把抽象的典章制度转化为可视的图像；行宫图定格皇家史迹，承载园林美学与边疆治理的历史信息；星野图完整铺展古人仰望星河而生的宇宙观念……一图一志之间，器物工艺、建筑营造、天文思想、礼制秩序、民族治理等多重历史信息彼此交织。卷帙浩繁的历代方志，保存着数量庞大的插图，如同一座尚待深度开采的文化富矿。随着持续的校勘、解读与研究，这些沉睡于方志之中的图像，将不断地为我们解锁那些被时光封存的历史密码。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物映中华

小器大雅品书拨

周 隼

传统文房诸物中，笔、墨、纸、砚为世人所熟知，而有一种形制小巧的案头雅器——书拨，或许少有人留意。书拨，也作书拔、书挑、书匕，专为翻检古籍书页而制，护书避污，添助雅趣，兼具实用价值与文人审美，古代笔记、器物谱录、金石杂著中多有记载。书拨虽微，却蕴藏古人读书之道、审美之趣、修身之心，值得今人珍视与品读。

书拨的出现，与古代书籍形制、读书风气密切相关。隋唐雕版印刷兴起，至两宋大行。线装宣纸典籍虽定型于明代，但宋代蝴蝶装、包背装书页同样薄软，用手翻检易留汗渍、墨痕，损伤纸页，护书翻页之器由此应运而生。对此，宋代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赵希鹄《洞天清录》云：“古人阅书，必以竹、象牙为书挑，不用手，恐汗渍损纸。”此为较早记录书拨功用的文献，明确宋代已有“书挑”。宋代周密《武林旧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亦提及文房小件有“书匕”“书挑”，皆为一物异名。至明清，文房清玩之风大盛，“书拨”一名广为通行，成为文房清供重要一类。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载：“书拨，以竹为之，长尺余，阔寸许，用以翻书，不损纸。”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专列文房器具，记：“书拨，象牙、乌木、紫檀皆可为之，取其轻滑，展卷不滞。”

形制方面，很多文献中都有对书拨尺寸、造型的描述。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云：“书拨，长七八寸，阔一二寸，一头微锐，用以开卷。”书拨整体狭长扁平，一端渐薄微尖，一端略宽便于持握，边缘打磨圆润，避免划伤宣纸。线装书为对折页，中缝紧凑，手指难以伸入，而书拨尖薄一端可轻巧探入页缝，拨开书页。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书拨，长五寸至尺，以竹、木、玳瑁为之，式如短剑，薄而利，不损简册。”其形制虽有长短差异，但轻薄、修长、尖端圆锐的核心特征始终不变。



清代铜质、木质书拨 江苏教育博物馆藏



清代青白玉透雕绦环纹书拨 北京观复博物馆藏

材质方面，文献清晰记录了书拨用料由普通竹木到珍奇玉石、牙角的等级差异。屠隆《考槃余事》载：“竹制为上，清雅；紫檀、乌木次之；象牙、玛瑙为贵，非寒士所用。”竹制书拨最易得，韧性好、易雕刻，是普通士子常用之物。紫檀、黄花梨等硬木书拨质地坚密、色泽温润，为“中产”文人所喜。高濂《遵生八笺》云：“象牙书拨，莹白细腻，最宜展阅；玳瑁斑驳，亦雅。”玉石类则更为宫廷、贵族青睐，清代宫廷档案《内务府活计档》多次记录：“造办处制玉书拨，刻诗文，进呈御览。”此外，银、铜、牛角等亦有使用。材质由朴至华，既反映工艺发展，也映照古代社会地位与审美趣味。

工艺与装饰上，明清书拨多雕镂题刻，融诗书画印于一体，文献亦多佐证。清代朱彝尊《曝书亭集》记：“竹书拨，刻小字诗句，行楷精妙，把玩可忘倦。”书拨常阴刻诗词、格言、山水兰竹，填金填墨，耐看雅致。阮葵生《茶余客话》载：“近时文士，多自制书拨，自书己作小诗，刻于柄上，以寄情志。”可见，书拨不只是工具，更是文人自况明志之物。雕刻技法以浅刻、浮雕为主，打磨务求光滑，正如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所言：“文房小件，贵在精洁，不可粗砺伤纸。”一件精美书拨，既是实用器具，亦是微型艺术品。

书拨的核心功用，自是护书翻卷，兼有书签、镇纸之用。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言：“不用手翻，防汗污纸，此古人爱书之意。”古代宣纸脆弱，汗渍、指纹极易使书页霉变破损，以书拨展卷，既是护书，亦是读书的仪式感。清代王士祯《香祖笔记》记载：“读书焚香，净几，以书拨展卷，不敢以手亵简册。”可见古人敬书惜书之心。同时，书拨扁平修长，可夹于书页之间作书签，亦可轻压纸角作临时镇纸。屠隆《考槃余事》总结：“一书拨，可代签、代镇，一器三用，甚便。”一物多用，尽显古人造物智慧。

古人以读书修身，以器物寄情，书拨承载深厚的文化内涵。书拨常刻梅兰竹菊、山水清音、修身名句，寄托淡泊高洁之志。正如清代张潮《幽梦影》所言：“器小而意深，物微而志远。”书拨代表着文人敬书、爱书、惜书的情怀，体现了雅致内敛的生活方式。焚香展卷、以拨翻书的日常里，沉淀着宁静自持的精神追求。

近现代以来，平装胶装书籍普及，线装古籍渐少，书拨渐渐淡出日常使用。但随着古籍收藏、文房文化复兴，书拨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综合历代文献可见，书拨承载千年读书传统，见证文人雅致生活，是中国传统文房文化中“小器大雅”的典型代表。

(作者系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化百科
中国文化报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0月20日是世界厨师日。描绘厨娘形象的壁画、执刀料理的庖厨俑……文物遗迹中，藏着古人厨房里的鲜活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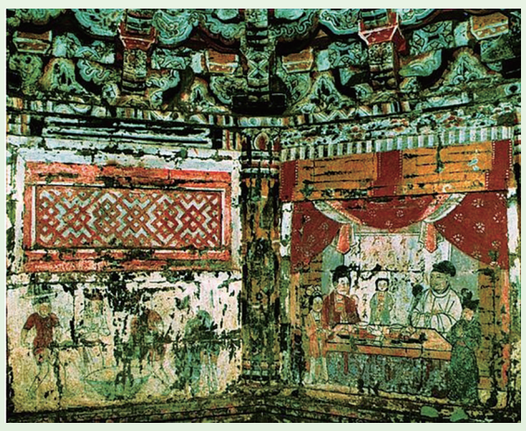
新安宋墓壁画

中国宋代壁画。

新安宋墓1983年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石镇乡李村，又名宋四郎墓，建于1126年(铭砖纪年作“宣和八年”)，为仿木结构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

墓室平面呈八角形，八角之间除一面为墓门外，其他7面墙壁均绘有壁画。正对墓门的一面墙壁上绘墓主人《夫妇对饮图》，夫妇二人左右端坐，中间一桌，背有帷幔，桌后站立侍女，墓主人夫妇身侧一男一女侍立。该图右侧依次为《庖厨图》，上雕格子窗，下绘两个女仆正在厨房内操作；两扇格子门；《乐舞图》，上雕棂窗，下绘舞乐杂剧。该图左侧依次为《交租图》，4名男子姿态服饰各异，一人头顶盆，一人从口袋内向外倒米，下有一锅，另二人已漫漶；两扇格子门；《花卉图》，上雕棂窗，下绘牡丹。墓门甬道两壁各有砖雕孝子故事两幅，其中之一描绘孟宗哭竹，其余3幅画面均较简略，亦无榜题和背景，内容尚难确定。壁画描绘世俗生活场景，用笔凝练，设色明丽，反映出北宋末年洛阳地区墓室壁画的时代风尚与地域特点。

(作者：邹清泉)



新安宋墓壁画描绘的宴饮与厨作场景

芒砀山礼制建筑遗址

中国西汉梁国祭祀祖先的礼仪性建筑。

位于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上，包括礼制建筑(宗庙建筑或祭祀建筑)和梁孝王寝园两部分。

其中，梁孝王寝园位于梁孝王墓前，1992年发掘。梁孝王墓坐西朝东，墓道向东，寝园在墓道东北侧，其南回廊与梁孝王墓道北壁相对。寝园平面呈长方形，四面有围墙。南北长89米、东西宽44米，寝园内面积3916平方米，分前、后及附属建筑三部分。前部以寝殿为中心，四周有宽2.2米的回廊环绕。回廊四面为宽1米的夯土墙，墙内侧有排列规整的石柱础，柱础之间的距离为1.95米。回廊墙与柱础之间发现大量的瓦片堆积，说明回廊有瓦顶。回廊内侧最南部为一座院落，院落四周用条石垒砌，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0米、南北宽18.6米。院落南侧有一门，与南回廊的门相对，应是寝园的正门，门宽2.2米，门内侧2.6米处有长方形石台，残存上、下两层，上层上部有垒砌痕迹，可以肯定上面还有建筑，应为门屏的基座。梁孝王寝园将门屏设于门内，是按诸侯一级礼制而建。根据门屏及门的位置、宽度，推断寝园大门无法通过车马，说明《礼记·曲礼》中记载的“客车不入大门”在此时没有发生改变。院落北侧为寝殿，是寝园内的主体建筑，位于寝园中部，现仅存平面近方形夯土台。东西长22.2米、南北宽16.4米，现存高度0.35至0.45米，面积364平方米。夯土台四周有排列规整的壁柱柱础、柱洞，可知有壁柱39个。柱洞为方形，洞内保留有方形石柱础，柱础间距1.3至1.5米。在寝殿的西北和东北，分别有一个曲尺形天井院落。

从寝园中门可进入寝园后部，首先是一个南面为墙、北面有立柱的开放性空场，其西侧有两间门朝北开的房屋。房屋和空场的北侧有一处院落，院落再向北为面阔五间的半包围结构房屋，应是文献中所称的“堂”。“堂”后为并排的五间房屋，房门朝北开，只有中间的房屋与“堂”相通。寝园东门门道内有一座房址，房内发现较多罐、盆、瓮、碗等陶器，东北部有灶。按照古代礼仪，庖厨应在整座建筑的东部，远离主体建筑，该房址位于寝园东北部，房内有灶和较多的生活用具，应是作庖厨之用。寝园东门两侧的护墙上发现有五处带有干支刻字的石块，有正月乙丑、二月乙未、三月乙未、五月壬申等，推断所反映的年代应为公元前150年，即寝园的始建年代。

(作者：张志清)

条目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有删节